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信仰 的 危机

〔美〕斯坦利·罗迈·霍珀 / 著
(Stanley Romaine Hopper)

瞿旭彤 /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信仰的危机

(The Crisis of Faith)

(美)斯坦利·罗迈·霍珀 著
(Stanley Romaine Hopper)

瞿旭彤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的危机/(美)斯坦利·罗迈·霍珀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ISBN 7-80123-769-2

I. 信… II. ①霍… ②瞿… III. 信仰-研究 IV. 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072010 号

信仰的危机

(美)斯坦利·罗迈·霍珀 著

瞿旭彤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2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3.09 印张 27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769-2/K·167

定 价: 25.00 元



前 言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出发考察当今文明的危机。当今的处境见证了一种人类精神之中的深刻矛盾。如今,我们得以看到了那些我们一路走来时就已潜藏在后的妥协模式——这些模式可以用来澄清迄今为止隐匿潜伏的含糊不清之处。从表面看来,人类最为紧迫的问题似乎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相应的经济问题。但我们知道,就深层次而言,有一些根本得多的问题正面临危险。这些更为深刻的问题关涉的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意义。这些面临危险的问题与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精神需要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关乎我们的本性和命运。最近一段时间的混乱状态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的思想必须、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向基督教信仰回归;而且,这确实是有可能的。现代人已经把自己带到了救赎问题(the redemptive problem)的面前——这是一个老掉牙了的问题:要想得救,我和我的世界必须做些什么?



信仰的危机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文化危机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在我们做什么和我们信什么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相互关系。任何对这种关系之本质的探究都属于实践哲学的领域。不过,这种探究也属于基督教人类学(Christian anthropology)的范畴,并且从而强化了信仰在我们所有实践决定中的优先地位。

当然,我们承认,基督教本身已经受到了质疑。因此,在我们提出如下声明的同时,恢复基督教对人的本性及其命运的理解对于世界的有序和稳定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并不主张简单地退回到历史。单单复制以往的历史综合,并不能恢复和谐。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要公正地对待在传统立场看来永远真实的东西,而且同时要考虑到在现代的试验中得到验证的东西。恰恰在基督教为全面理解危机提供唯一真实之钥匙的同时,存在着这么一种意识:危机有助于澄清基督教信仰的真正本性。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澄清人类需要的基本性质。然后,我们将说明如下两种基本原则是如何可能合为一体的:一方面是信仰优先,另一方面则是经验诉求。

[一方面]经验诉求至今也没能做到完全的苏格拉底^①化。彻底运用经验诉求这个原则,本会导致苏格拉底式的“生活批判”,但是,经验诉求在追求纯粹“科学化”的同时却逃避了这种批判。另一方面,信仰诉求遭受了教条主义

^① Socrates, 公元前 469 - 399 年, 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dogmatic)、律法主义(legalistic)或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的磨难和削弱,因此,试图让信仰和真正创造性的生活解释产生相互关系的种种努力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正如真正的基督教的生活批判是经验诉求的圆满实现一样,启示(revelation)和信仰的内容必须创造性地、福音化地(evangelically)得以实现。十字架可被视为这两种诉求的汇合点。

在这样的时代,“预言、启示、对未来的瞥见和研究”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自从斯宾格勒(Spengler)^①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问世以来,许多诗人、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改革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都充当了先知性的角色。对于他们之中的所有人,我都心存感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好比先知性的触须,触及了此世将要发生的东西。读者无不对其严肃认真的作品、对其深入探究人类本性之内在问题的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试图征引论据处理当今危机这个问题时,他们的作品和探究方式都是我不可或缺的素材。从这些作品中,我采纳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并且有意做了一些相关的脚注,以便有意诸君由此能够找到那些最重要的相关文献资源。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我应该感激的是谁。当然,我的目标不是复制别人的思想,而是在其中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

本书没有从理想要求的角度来处理各种人物、运动和观

① Oswald Spengler, 1880 - 1936 年,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信仰的危机

念,也许这并不令人称心如意;但是,概要性的处理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评介人物时,本书并不面面俱到;而且,本书删节了一些历史运动和观念这不啻为一种冒险,因为它可能会歪曲一些因素——然而,出于本书的意图,这些因素必须被当作次要的。我的主要意图在于:强调那些能够说明命运的因素、那些有助于澄清基督教的恢复方式的因素。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时代正因为追求真理而痛苦不堪。它满怀渴望寻求的真理正是其失败和挫折向希望和荣耀(hope and glory)的一种特殊变形(transfiguration)。但是,时代并不理解这一点,它还没有看到在基督里面(in Christ)有着何等的荣耀、“在他里面万物都连接在一起”。

斯坦利·罗迈·霍珀

S. R. H.



引言 午夜时刻

正如丘特切夫(Tiutchev)^①所言,我们时代的文明已经到了“沉默无言的渴望时刻”,其时,人“没有家园,举目无亲、孤孤单单、虚弱无力……[他]看到的和知道的只是一种宿命的遗产(a fatal heritage)。”这份遗产植根于我们的过去;关于这过去,我们无从知道它有多久远。这份遗产也植根于现代的灵魂;关于这植根,我们并不愿意说出它有多么深。但是,这份遗产是属于我们的,而且“人人都必须褪下面具的午夜时刻”最终已经来临;那些关注迷茫的、痛苦的、渴望的、争斗的和无能的世界的人对此一清二楚。这个午夜时刻是我们共有的;因为这样,如今有少数人逃避了对灵魂之谜的思考。

令人担忧的是,文明正在逐渐失去胆略。我们的时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些势力正在兴起,它们强大得足以湮没和废弃数个世纪以来的遗产。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是整个文化的

① Fyodor Ivanovich Tiutchev, 1808 - 1873 年,俄国诗人。——译者注



信仰的危机

危机,是自基督教时代开始以来最为深刻的精神危机。莱昂·布卢瓦(Léon Bloy)^①曾简明扼要、鞭辟入里地断言,“在万事万物的尽头,人如丧家之犬,走投无路”。

这意味着,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近乎是无限复杂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遇到了多重的固有矛盾——仿佛灵魂深处的基本矛盾,被多面镜子从任何可能想像到的角度一次又一次地被反映回来。尽管如此,当时代的各种基础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当结构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文化或文明所谓的和谐暴露出其内在矛盾的时候,当长期延续的根本错误显示出文化或文明的前后不一致的时候,与“危机”一起到来的还有不少有利之处。一方面,危机时刻充满了宿命(fate),这文明有可能如同以往的其他文明一样就此消亡。但是,另一方面,危机时刻也充满了各种预言性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涉及的绝不只是我们自身及所处世界得以解放的美好前景。

不过,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在现存处境中抓住具有预言性的任何一样东西,紧紧地抓住它,就像雅各(Jacob)在雅博渡口(the ford of Jabbok)紧紧抓住天使一样;因为在万事万物的尽头,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走投无路的人就是一个像雅各那样的人。在某种的深层意义上,我们正是在时代的暗夜中与上帝的天使摔跤。我们所寻求的也正是雅各所寻求的:知道上帝的名。因为直到我们知道上帝的名,我们才能正确地知

① Léon Bloy, 1846 - 1917 年,法国作家。——译者注



道我们自己。^①

于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人类处境的两个基本方面,宿命的遗产和信仰的遗产,就出现了对立。倘若我们忽略前者,或者以某种杂耍般的奇迹越过前者,这是十分便利的。这种忽略如同我们越过自己的头顶一般,的确是一个奇迹。危机的意思恰恰在于:我们的信仰遗产出了问题。人们长期以来信靠的原则受到了致命的威胁。躲在背后的怀疑主义切断了一切主张的根本,从而削弱了所有的道德行为、取消了所有旨在恢复的简单方案和旨在改革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首先做的不可能是去向信仰咨询;因为,恰恰是信仰本身出了问题。怀疑是在先的。这怀疑隐匿于人类心灵的深处。由于怀疑的缘故,人对世界深感失望,几乎不再可能振作起精神、起来推翻扬言要毁灭世界的各种幼稚的暴政。

在每一次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都会出现两种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两种可能性,是因为人类有自由;在

① 典出《圣经·创世记》32:22-32。新国际版研读本(新泽西:更新传道会,2000年)的如下相关注解或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神在雅博(yabboq)与雅各(yaaqob)摔跤(yeaheq)(作者喜欢用谐音字)。雅各一生都在挣扎求胜,先与以扫,后与拉班。现在,当他要再进入迦南之际,神向他表明,他必须与‘神’摔跤,因为他的命运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译者注



信仰的危机

我们的“有限处境”当中，自由可以对原因因素(causal factors)产生影响。判断得当地运用自由、成功实现人类在世上的各种正义目标，就会走向命运(destiny)。判断不当地运用自由、再恶魔般地加上结果对原因非位格化的连续性影响，就会走向宿命(fate)。一出生存的戏剧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上演着。

因果因素(the cause-and-effect factor)本身并不是宿命的，也不是邪恶的。当我们谈及自然法——一个总结了我们的幼稚判断的术语——的时候，我们言说的只是我们已经部分掌握的东西。通过观察它的规律，我们理解了它的本性。即使是小孩也很快就能学会：摔跤是危险的、某某东西被割了、某某东西烧着了。我们依赖规律，依赖因果(或者可以预知的因果序列)的重复出现。藉此，我们力图实现我们的目标、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是，当我们与之发生冲突的时候，或者当精神楔入作用于自身的两条规律之间——这两条规律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如同两个磨盘——我们的希望因而被碾成粉末的时候，我们陷入古时的尊严之中，并且称之为“宿命”。

不过，宿命的因素非常复杂。作为因果力它制约我们。作为时间，它追逐我们。作为有朽性(mortality)，它侵袭我们，把受造物的最后大限强加给我们。但是，我们怨恨种种限制，藐视限定我们的种种条件。当人类自由这个工具被悖逆地使用时，人类自由就与宿命达成了一种恶魔般的共谋关系，并且把自身精神饱满的、却又反精神的动力赋予了因果的重复出现。最近一段时期，这种魔性意识已经进入了世界，事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严峻。但是，充满悖论的是，我们丧失



了对于宗教意义的方向感,挣扎的无望弥漫在非人格化的世界里面,这压倒一切的无望恰恰使得魔性意识莫名其妙地丧失了效力。小小的暴政已经篡权夺位。对于人类的结局或者命运,我们不再有确定的把握,我们丧失了支配能力,不得不因为时代的选择被宿命的大浪裹挟而去,从而被卷入很久以来就已为我们预备好的厄运当中。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已被启蒙的世界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发生本身就不啻为一次出乎意料的转折。这次转折是对现代历史的图谋的急剧逆转,对于理性、进步和人的各项权利来说则意味着它们的失败下场。这次转折不仅仅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而且突然地暴露了现代人的内在无能。人的受威胁感、不安感和挫折感不仅是宿命的,也是预言性的。之所以是宿命的,是因为人确实确实饱尝不幸。之所以是预言性的,是因为我们由此感受到了一种新的要求:即全面修正我们的各种假定。

在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过程中,这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一次初步的心理退缩。这次退缩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起初不肯承认失败;另一方面是如今不肯做出新的决定。起初的经验充满了宿命;我们宁愿逃避而不愿直面宿命。宿命如同来势汹汹的复仇女神(Furies)^①,追上了我们。后来的经验破除了我们原以为安全的幻象,带来了饱尝苦楚的努力和冒险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三女神,她们是“土地”和“黑暗”的三个女儿。——译者注



信仰的危机

——冒险在新的委身中是极不寻常的。危机意味着：我们力图逃避的宿命追上了我们，我们原以为牢靠的前提破碎了。我们犹如丧家之犬，走投无路。因此，我们变得焦虑，这焦虑是伴随着每一次致命的毁灭而来的。

若经历过这种宿命，人在道德上就变得容易被催眠。我们的处境就如同一位突然被“闪将”(Discovered check)^①的国际象棋棋手的处境。介于己方国王和对方来犯棋子之间的防御性棋子突然被吃掉，国王不得不暴露在来犯棋子面前。[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我们自己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些服务于捍卫我们文化的观念突然被拿掉了。人性本善的神话、人类无限进步的神话、理性自满自足的神话这一类的防御性观念，本来介于同时代的人——那个小小的国王——和文化所受到的威胁之间，如今都被去除了；于是，现代人发现，他们的希望和目标遭遇了普遍性的危机。

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了这场危机中的宿命因素，精神的窒息在20世纪的上半叶随处可见。欧洲大陆各种学派的虚无主义、现代诗歌神秘的失败主义(the esoteric defeatism)、国际政治范围内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兴起、人们的困惑和冷漠，都见证了危机中的宿命因素。唯一可以与这比较的是古典时期的天罚(the classical nemesis)：人若冒犯了报应女神，就会遭到残酷无情的追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迫在眉睫的天罚变得越来越致命，因为它是非人格化的、机械的和确定

① 指移动一子将对方的军。——译者注



无疑的。

不管我们转向何方,我们都会发现
人已被自身的自由俘虏
可被测量的正在掌管
那本为测量者的人……

……

那不是巨人、神明、或侏儒,
而是一个奇怪的人类同形体(one odd human
isomorph)。^①

但是,这种对人类尊严的麻木和冷漠带来了一种积极的因素:在危机之中,人由于文化或文明的错误前提受到了报应,与自身处境的种种界限发生了尖锐冲突,而且还反过来维护这些界限——这仍然是积极性的因素。这种积极因素在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②的笔下得到了清晰的说明:当人跳下悬崖时,他并非没有服从地心引力的规律,而只是证明了这种规律。类似地,当某种文化或文明跳下悬崖时,它并非没有服从制约它的种种本体论条件、或人的本性、或上帝的本性、或人在上帝之下的命运的本性,而只是证明了它们。总而言

① W. H. Auden, *The Double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p57, 69.
(Wystan Hugh Auden, 1907 - 1973 年,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左翼青年作家领袖,40 年代思想向右转变,后期诗歌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46 年入美国籍。——译者注)

②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 - 1936 年,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著有小说、评论、诗歌、传记等,以描写布朗神父的侦探系列小说最为著名。——译者注



之,我们的推理在危机时刻与事物的最终本性和意义发生了冲突。由此,宗教性的和形而上学的对人的理解得到了更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或文明一旦在第一原则上走偏了,就会在根本上与自身发生辩证的冲突。这就好像多头怪蛇许德拉(hydra)^①的情形。它起初长得很快,生出了多头;最终却被多头之间的彼此抵触逼疯了。多头之间互相撕扯,直到许德拉被折磨至死。这是一种被宿命决定了的情形,它从反面说明了,“野兽的本性”是我们一开始就固有的。我们今天看到,许多邪恶的对立物正互相撕扯着,并扬言要摧毁人类所知的并珍爱有加的“西方”。

西方面临着自身的已急剧偏离东方的各种原则。由此,西方的意识拥有了一种焕然一新的、因而史无前例的视角。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剧烈冲突,外在地证明了现代人精神深处的内在分裂。

举例而言,当今的冲突显然首先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的对人与世界的看待方式之间的冲突。这些悖逆的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世界观的内部,是出自西方文明内部的反叛形式。这种反叛来自对迄今为止被广泛承认的如下原则的敌意:自由、正直(integrity)和人的各项权利——这些事关人类尊严的原则来自基督教的和古典的源头,因此这些源头也遭到了反叛。反叛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于:上述原则被狡猾的妥协严重地削弱了,以至于大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蛇。——译者注



多数人不再诉求伦理上的澄清和道德上的差别。

长期以来,这种道德上的混乱玷污了我们文明藉以形成的前提,却在今天得到了一些最著名的思想家的认可和支持。道德的混乱已深深地嵌入了大多数人的“意识流”之中,并且由此塑造了他们的思维范式——这些人本来就疏于思考。道德的混乱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反叛的势力,同时减弱了那些可能已经胜过道德混乱之人的活力。正如各个时代伟大的实践智慧所批评的一样,我们没能持守住自己的心智,从而步入了道德虚弱的时代。世界之中存在的分裂植根于现代人的精神之中;如今这种分裂已经昭然若揭。与此同时,这些缺陷还深深地隐藏在人的内心当中。

所谓“现代的”态度的假设是:自满自足的人具有普遍的自主性在这种态度之中,有些东西正在经受死亡的阵痛,有些东西已经完蛋了。主义之争,就其负面而言,争论的内容乃是各种似是而非的目标的偶然表达、或者这些目标的相互矛盾。在这种“现代的”态度中,一些以往失败无效的成分已被肃清。以往关于“西方”的狭隘观念已被更新鲜的、更高级的“全球意识”抛到一边。基督教自身也正在察觉,自己与西方思想中相继而生的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联盟不仅限制了自己的真精神,而且也使得自己成为了各种次要事业、政府和制度的同伙。这也是一种负面性的揭露。

因此,在每一次危机中,我们都可以区分出两种倾向:宿命的因素和命运的因素。这两者的对立引发了危机的高潮时刻的到来。不过,危机自身并非终结,而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悬



而未决的时刻：一切事物都悬于生与死、胜与败的不确定之中。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仅必须详细说明我们遗产中的宿命因素，而且必须运用我们拥有的走向信仰和命运的遗产中蕴涵的原则对现代意识施加影响。

二

要想触及问题的根本，任何人都必须使用某种方法。在澄清我们的遗产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辨认清楚任何方法都会具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即主观的或辩论的方面，灵魂由此必须承认自己在问题中的共谋地位。这里的危机如同疾病一样意味着生死之间争斗的高潮。处于危机之中的文化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精神是否葆有足够的活力、从而能够做出新的果断决定。另一方面，即客观分析的方面，我们藉此追溯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以便能够判断出我们的文明在历史上的哪个点或哪几点走歪了。单单从这两个方面的某一个出发进行探究，这并不困难；但是，要是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这正是文化分析所必须做到的——似乎就会把灵魂不无冒险地置于客观研究和主观要求之间的逻辑不清之处。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①敏锐指出过的：“想要找到通往危机本源之路的人必须经过真理已经沦丧的领域，从而占为己有地改变

^① Karl Jaspers, 1883 - 1969 年, 德国哲学家。——译者注